

# 王阮：三年为官求“三异”

□林君霞 王青

王阮(1140~1208年),字南卿,一名元隆,号义丰,自称玉局先生,南宋江州德安(今九江德安县)人。王阮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勤奋好学,饱读诗书。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登进士第,自此踏上仕途,晚年归隐庐山。

“妄意弦歌学子游,迄无三异比中牟。丁宁今夜东风雨,添起潮头急去休。”宋绍熙元年(1190年),任期满三年即将离开昌国县(今舟山)的王阮提笔写下《留别昌国五首》,这是其一。诗中“迄无三异”出自汉朝鲁恭典故。鲁恭在东汉章帝建初年间(76~84年)任中牟县令,他着重以道德风尚感化人,不依靠刑罚命令惩治人,尽量说服,使犯法者自感悔悟,深受人民爱戴。

《后汉书》卷二十五《鲁恭传》记载,鲁恭拜中牟令时有“虫不入境”“化及鸟兽”“竖子有仁心”三异。王阮诗中说“迄无三异”,是隐含对自身功绩的谦逊反思,也是希望并要求自己努力达到前人的“三异”政绩。

那么在昌国县任职的三年,王阮是否达到前人的“三异”政绩呢?



记者 张磊 摄

## 行路不止,抒胸中之愁

宝庆《四明志》卷二十《昌国县志》载县令题名云:“王阮,承议郎,淳熙十五年到任。”在这之前,王阮历任过南康都昌(今江西都昌)主簿、永州(今湖南零陵)教授,新昌县令(今江西宜丰)。到淳熙十五年(1188年),时年48岁的王阮来到昌国县(今舟山),开始了他的又一段任职生涯。

初到昌国的王阮,深感压力很大。这在他《宿祖印寺》诗中有所流露。

下马杉松石径幽,暗泉一带抱山流。  
长扉隐隐丹青古,香雾蒙蒙日夜浮。  
缺月有情还委照,羸人无语独登楼。  
急呼老瓦招欢伯,为洗胸中万斛愁。

祖印寺位于昌国县衙前面。诗中描绘了寺庙的宁静致远、深远的历史底蕴以及旺盛的香火。然而此时的他却没有沉醉于寺庙的景致中,此刻的他急需一碗“欢伯”(酒的别称)来洗尽胸中的“万斛愁”。

他愁什么呢?可从王阮的《昌国偶成》窥知一二:

诸行皆山可夜驰,海中昌国力难施。  
风浪阻渡由天地,期会中严限日时。  
愿以老身从此免,忍将人命逼诸危。  
交门山下须臾死,肉食诸公知不知。

这首诗正写出了他的深重愁绪。

从诗句中能感受到王阮愁的是“风浪、潮汐使得海上航行充满危险;自然灾害,使得民众的苦难难以解决;还有沉重的劳役和官府的严厉命令使得民众的生命岌岌可危;然而那些高官厚禄者,他们不理解民间疾苦,不关心民众的苦难,对此漠不关心”。举杯消愁愁更愁,此刻王阮需要行动起来,他决心让昌国的百姓安居乐业,物丰邦宁,以消万斛愁。

于是在上任后,王阮积极深入基层一线,广泛接触民众,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他曾多次乘坐小船,来到衢山岛,下乡劝农,并在吉祥寺作了首诗——《劝农题吉祥寺》:“傍石寻幽径,穷源得梵城。潮声四面合,山色一团清。农舍巡门劝,僧倾倒屣迎。明年吾更健,来此伴中耕。”

衢山距离本岛很远,岱衢洋风急浪高。王阮不辞辛苦,挨家挨户走访,深入了解农民的困难,鼓励他们积极投入春耕春种的忙碌之中,充分显示了为他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

## 求降甘霖,解百姓之苦

在王阮任昌国知县期间,该地遇到了严重的旱灾。昌国县的岛屿大多远离大陆,依赖自然降雨,一旦发生旱情,只能通过船只从镇海(今宁波)运水至昌国,这对百姓生活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当地民众生活是相当困苦的。

面对自然灾害,作为知县的王阮感到无能为力。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亲自带领手下官员前往普陀山的宝陀寺,向观音菩萨祈求降雨,希望得到神灵的庇佑。王阮祈雨时的心境可在诗作《普陀山观音岩祈雨》观之一二。

南风不为雨,躬即宝陀求。  
地势到此尽,天河相接流。  
整升千丈背,屣吐数层楼。  
念彼观音力,杨枝洒有秋。

首联和颔联交代了祈雨的缘由以及时间地点。“南风不为雨”,一旦南风不停,天气势必炎热无雨。在这种情况下,王阮只好“躬即宝陀求”。“地势到此尽,天河相接流。”据此可以推断,进行祈雨仪式的地点应该面向大海,而且只有在夜晚才能目睹“天河”的景象,这意味着在临海的寺庙中,晚上举行祈雨的佛教仪式。

“鳌升千丈背,屣吐数层楼”,颈联描绘了一幅非常绚丽的景象,王阮仿佛目睹了观音菩萨站在莲花之上,踏着鳌鱼,乘风破浪,正向昌国方向疾驰而来,这一幕让他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尾联“念彼观音力,杨枝洒有秋”,他极力祈求观音助力,解除昌国旱情,施甘露于万民。

王阮对观音菩萨的感应深信不疑,不仅仅出于对天灾的无奈之举,也基于当时对佛教文化的信仰。因此,王阮深信,只要他诚心念诵观音的名号,观音菩萨必定会降下甘霖,使得昌国在秋天能够迎来一场丰收。王阮不畏艰辛,乘坐小船,登上普陀山,面对大海进行祈祷,跪拜在岩石前,向观音像深深叩拜,表现出无比的虔诚。之后昌国全境降下了一场大雨,旱情得到了缓解,大家传说是他那为民请命的赤诚之心最终感动了天地。

## 集资修桥,解行路之难

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是王阮在昌国任上的第二年,他发现集市中心张家闸上过道过于狭窄,东西两边百姓过闸上时只能单独单向而行,若双方有人同时过闸,就必须相互避让,这既不利于百姓的出行,也不利于集市的发展。

作为知县他知道要使县内的交通更加畅达,使集市更加繁荣兴旺,必须先修路建桥,将东、西街市连成一线。于是由王阮出面向民间富户集资,在原张家闸旧址上兴建了一座石砌拱桥,沟通东西交通,解决行人“行路难”的问题。

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三“桥梁”云:“市桥旧名‘状元桥’,往宋绍熙元年(1190年)令王阮创建。”原来,在修建桥梁挖掘地基的过程中,工人们在污泥中意外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古石,上面刻有“人从石上行,状元此时生”这十个字。王阮听闻这一神奇现象后非常高兴,于是决定将新建的桥梁命名为“状元桥”,并将这块古石放置在桥头作为标志。同时,在桥的北侧还建了一座小土地庙,供百姓祈求福祉,作为守护桥梁的神灵。

到了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居住在状元桥边张宅的张信考取了状元。王阮所建的状元桥,最终真正见证了状元的诞生,这对后来的学子们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与其他地区通常先有状元后以状元命名桥梁不同,昌国是先有了状元桥,然后才出现了状元。

状元桥是舟山有志书记载的最古老的桥,如今位于定海城区最热闹,最繁华的中心地段,原址在横塘弄口与竺家弄口之间,老城以状元桥为中心,分东、南、西、北、中5条大街,连接东、西大街。数百年

间,舟山一直流传着“状元桥风水好,应徽符”的说法。

状元桥不仅让当时的东西街市得以贯通直行,解决百姓出行之难,也把“重教兴学,劝学进取”的理念深深灌注进民众心中并传承了千年。

## 迁建学宫,兴昌国之教

所谓学宫,是古代地方政府设立的学校,堪称地方的“最高学府”。定海的学宫由来已久,最早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置翁山县治时,创建学宫于覆山之麓(今东门鳌山新村),但是没过多久就被废除了。

直到宋熙宁八年(1075年),昌国县令张懿文建学宫于县东一百步,之后又经历几次的迁建和重修。时间来到淳熙十六年(1189年),这是王阮担任知县的第二个年头,他观察到学宫已经有些陈旧,并且得知自从县令张懿文建立学宫并传授儒学以来,昌国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考中进士,更不用说状元了。这让王阮深刻意识到,要振兴昌国,必须从教育做起。钱棫《迁学记》载之:“王阮发誓:若不为昌国成就文教,死亦不住他地。”

昌国的振兴需要教育,教育需要更好的教学环境。钱棫《迁学记》就详细记录了这次迁建,“慨然有意迁至捕厅之南,有隙地数亩,秀气盘结,若天造地设然。于是辨方位,营新始,于殿宇讲堂次第以成。东序甫毕,君以通例理去官,且捐缗钱三十万以助其役”。

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二“学校”云“学宫在州东一百步,淳熙十六年(1189)令王阮徙于丞厅之南”“学肇基于县治之东,淳熙间令王阮迁于芙蓉洲”。王阮把学宫迁到了县衙南面这个重要的位置,并扩建了食堂、宿舍这些设施,为莘莘学子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王阮重建学宫这一重举,对昌国兴学重教影响很大,从此,昌国文教丕振,魁辅辈出。

后来的几任县令也继承了王阮的重教兴文的传统,此后,舟山从“未有登第入仕者”一下子成了进士多产地。据光绪《定海厅志》记载,自南宋绍熙四年(1193)至咸淳九年(1273),昌国县共有33人中进士。

如今,昔日的学宫已变为定海第一中学。学宫原来的一些建筑被陆续拆除重建,如今保留下来的还有泮池和泮池上的石拱桥以及校门东边的御书楼。王阮修建学宫的原貌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在古学宫的遗址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古代先民对教育的敬畏。

在《新昌书座右屏》中王阮写下自己为官的准则与宗旨,这也是他给自己的座右铭:“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退作陶渊明,进学何易乎。便愿列循吏,宁甘为鄙夫。祸福置不问,吾民其少苏。”

纵观他在昌国任职的三年,他一直在践行自己座右铭所说不谋私利、一心为民,置个人“祸福”于度外。离昌之时,王阮提笔写道:“妄意弦歌学子游,迄无三异比中牟。”他希望并要求自己努力达到前人的“三异”政绩。他是否达到?我想,如今的舟山人民仍然保持对状元桥和学宫的敬重,仍然保有对重教兴文的热忱,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

# 太平桥

□李慧慧

我已经是老老人了,还是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我安静地躲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属于我自身的东西只有扎在河里的三根柱子了和几分残缺的身子,如果不是水泥在身上浇了几次,或许这也是保不住的。虽然我不喜欢水泥的味道,我依然想念我原来的气息。

那天,我在河里沉睡,听到桥上传来一阵稚嫩的声音:

妈妈,这是太平桥吗?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母亲的声音有几分迟疑:或许是吧,我再看看。应该是这里啊。

其实那位母亲就站在我的肩膀上,但她感觉不到我,她心中想像的我,可能不是这般,水泥浇灌的,平凡的不起眼的,和普通的桥没有区别的我吧。

那位母亲站在那里,往左看了几眼,往右看了几眼。四处寻找。左边有两位大妈在洗衣服,右边有一位大伯在田里忙碌着。他们的日常也是我已经习惯的陪伴。村里几乎已没有年轻人了,但老人还在,让我觉得自己还有几分温度。

那位母亲终于在边上杂草中看到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舟山市岱山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太平桥”字样,字没有用颜料涂抹,时间久了,有点看不清。那个小女孩费劲地读着上面的日期“二〇〇四年一月”。

是了,这就是太平桥。

我不知道这世上有多少根叫“太平”的桥,他们为什么而存在,是否还存在着?太平是个很常见的桥名,历史上有名的太平桥很多,比如,安徽金寨县的太平桥。在全椒县,一直有“正月十六走太平”的传统民俗,自东汉开始,传承迄今,盛况不衰。古镇牛庄也有太平桥,是其标志性建筑,是牛庄迄今为止唯一一处未曾大规模仿建、重建的历史遗迹。而最有名的,应该是上海的“太平桥”,当然那块横跨跨铁浜的太平桥也被“浸润于新辟的太平绿地的湖底下了,原有的名声也因为毗邻的新天地之崛起而变得风光不再”。

女孩问母亲:为什么我们眼前的这根太平桥是这样的呢?

对,是这样的,因为以前那块石板破了没法用了,人们用水泥浇灌,总还保留几分坚固,我的身体还带着一丝旧时的痕迹,披着斑驳的阴影,带着属于我自己的气质,我就像人类行将就木的老人,一个固执的孤独地躲在自己的角落里不声不响的老人。

已经很久没有人对我感兴趣了,村里的人来来往往,经常路过,他们并不关心我来哪里,以后会如何,我叫什么名,或许年轻的人们甚至忘记了我叫什么名字吧。我的来历,在县志中并没有记载。那也有同样的名字,但显然不是我。

1993年出版的《岱山县志》中,关于太平桥的记载是这样的:址在岱东乡虎一村。石桥,清乾隆间建。长4.2米,桥面石条,长3米,宽2.6米,高1.3米,桥墩1座,2孔,跨径1.5米。2013年出版的《岱山交通志》里关于太平桥的记载也同县志一样,或许交通志是根据县志来写的。

而我,生活在东沙镇司基村,我一直住在外司基龙山脚下。据当地百姓说,是当地郑家第一代祖宗郑大章建造的。郑家的族谱上有记载。据说,郑大章是个良善之人,看到百姓们往返两个地方很不方便,有要紧的事儿还得绕远路,便有了我的存在。

我真正诞生的日子,是清乾隆五十六年,那时的我是双孔石板平桥。前几年还有人在我的南侧石条厚度上看到过刻有“大清乾隆伍拾陆年造”的字迹,后来,有人来找过,一直没有找到,或许后来又消失了。关于我的介绍,边上有块立于2004年的碑文上写着:太平桥是司基村的交通要道,也是岱山境内唯一保存完整的清代双孔石板平桥,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通长7.4米,宽1.8米。

对比数据资料,我知道,县志中的太平桥不是我,只是恰好跟我同名罢了。虽然我的确有许多巧合的地方。但是那个太平在虎一村,属于岱东镇,而我属于东沙镇司基村,虎一村与司基村还是隔了一些距离的,所以,志书中记载的太平桥肯定不是我。或许岱山真的有两根叫太平的桥?桥名一样,建造的历史也相似(都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只是地址不同。

岱东的那个太平,我不知道他如何了?我只知道,如今的我,虽然有些是新的,但并不好看。扶栏是新的,朱红色的栏杆与我本身的气质很不搭。我原先应该有什么样的扶栏呢?

那位母亲带着小女孩在附近杂草丛生的田地边发现了一块断裂的石碑,她不能确认这是不是当初属于我的扶栏。我也感到陌生,或许并不是最初的那一块,或许是也,我已记不清了,时间久了,模糊的,但我觉得应该是属于我的。那断裂的石碑被一簇簇茂密的杂草所掩映,孤独地躺在路边。上半部是栩栩如生的狮子,下半部左右两边各有一幅精致的花,雕刻很细致。以此推断,可能是属于我的,只是不知为何只剩下了一半,不知哪一年被谁撞断了或者在新建的时候拆掉了。

很多人在上面走过,不会停下来看我一眼,没人注意到我在边上的石碑。很多人无数次走过,但不知我的来历。我隐藏于乡间,那么的平凡,跟村里那些普通的民间桥没有明显的区别。我从出生那天起就在司基,司基是个很小的村子,离东岳宫很近,熟悉岛城历史的人们应该知道,那一场轰轰烈烈的盐民运动是在东岳宫燃烧起来的。在革命斗争年代,东岳宫一直是地下党活动和组织盐民渔民开展斗争的一个集会地,一系列的盐民运动在这里点燃薪火。那一年,一万多个盐民齐聚东岳宫,声势浩大,规模空前。那一天,或者说那一段时间,陆续有人经过这里,有谁渴了,舀了河里的水解渴,还有人摘了路边的瓜果当作午餐,然后,为了某种信念匆匆奔向东岳宫。他们心里燃烧着火苗,他们脚步坚定,他们奔向远方。

我一直在那里,岸边的绿草,久久缠绕,生生死死,历经春夏秋冬。我的周边,起起落落,有些消失,有些重建,有些从虚无到现实。一代一代的子孙,离开这里,有人从这里走过,再也不会回来,有人从这里走过,回来时无须用脚走路。

有人后来又经过了这里,有人或许再也没能走过这里。